

张芝联 著

二十年来演讲录

(1986——2006)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二十年来演讲录

(1986——2006)

张芝联 著

K091-53
ZM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来演讲录 / 张芝联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1

ISBN 978 - 7 - 108 - 02797 - 9

I. 二… II. 张… III. 法国 - 历史 - 文集 IV. K56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5399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40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变革中的中国	1
人权研究在中国	9
提高大学科学水平的途径	13
香港回归祖国：一个历史学家的感想	23
未完成的启蒙：中国的经验	29
回忆旧上海	36
关于人权问题	43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与历史研究：简要的回顾	57
18、19 世纪的欧洲	67
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忧虑	131
18 世纪（乾隆时期）中国的新经济和社会思想	142
中国大学世界史教学及观念的变化	150
对 20 世纪中国的个人回顾：赠意大利汉学家 恩里卡·科洛蒂·皮舍尔	157
关于启蒙运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165

2 二十年来演讲录 (1986—2006)

18 世纪 (乾隆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

争取自由的三种形式 _____ 176

评法国汉学家杜明近著:《中国向何处去?》 _____ 183

泛谈“汉学”与“汉学家”的作用 _____ 188

我和德国学术界的联系 _____ 196

附录一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致

张芝联教授的信 _____ 202

附录二 前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吕厄致

张芝联教授的信 _____ 203

张芝联教授简历 _____ 204

变革中的中国*

主席先生、尊敬的来宾们、史学研究的同仁们、朋友们：

感谢毕林顿博士，谢谢您的热情致词，也谢谢您让我荣幸地会见在座诸位，并作发言。我的发言既非正式演讲，也不是我作为客座研究员的成果汇报，只是这次“对话晚会”的一个开场白。题目还是受性情开朗、足智多谋的吉福德教授的启发。有兴趣听我讲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的人大概不多，这个题目留待三年后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时再谈。在座各位想必都希望了解近七八年来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听听我的看法。

既然是谈我的一孔之见，不妨先略为介绍一下我自己，也许有助于大家了解我的立场。

今年适值富布赖特基金会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我首次踏上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恰恰在四十年前。当时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在哈约·霍尔本、威廉·邓纳姆、拉尔夫·特纳和路易斯·柯蒂斯四位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研究生课程，受益良深。

* 本文是1986年11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所作的讲演。

正在这个时候,我国不幸发生内战,马歇尔使团的调停失败,我的学业也随之中断。我不得不赶回祖国,以照顾我的母亲,照顾父亲的藏书以及我的学校,当时我任一个中学的副校长。这就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儿子对时局变化的反应。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政治上,我是置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中间的无党派人士,致力于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我和许多在1949年三十岁当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万千的潮流中游泳,有时顺利,有时沮丧,对新制度一度充满信心,也丧失过信心,后来又重新获得信心,受遍令人向往和令人心碎的经历;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煎熬而活了下来。同国外隔绝多年后恢复接触(1983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下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后来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事业。说来也怪,经过如许波折,我承认自己今天还是服膺儒家思想的自由主义者、爱国者、世界主义者;也接受了一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句话,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种种特点,我应有尽有。

言归正题,我认为变化中的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不是负面的、消极的。在西方眼中,中国历来是个谜,一个狮身人面像。西方人早在中世纪就对中国发生兴趣,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在《随想录》中写道:“你可以说,中国幽晦不明。我却说中国固然幽晦不明,但是有光可探,去寻找它吧!”最近一位法国政界人物访华,取道1793—1794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走过的路线,企图通过重游那位贵族踏过的旧地,看看中国在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保留原状。他正在写一本书,题为《停滞的帝国》,实际上他也在寻找帕斯卡所说的“光”。但是“光”在何处?让我们先看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再重复也不为过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四十年。孔子说：“三十而立”，意思是独立生活。但是，我们建立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是一场宏伟而史无前例的试验。治理一个温饱尚待解决的十亿人口的大国是多不容易，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进行任何试验，都允许留有失误的余地，有时还是较大的余地，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有过惨重的失败。总的说来，人民的衣食住行一般情况比从前好，中国也能发射装有核弹头的远程导弹了。但是，全民的人均收入仍然低得可怜，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国家财政短绌，文盲比例甚高，超过二亿，能源、运输、住房等等仍然是我们的大问题。

我们与世隔绝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从近处看来，这不是件坏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对世界都极为不利。“体面的孤立”自有其甘苦，但绝无光明可言。政治上，我们也有过起伏，大陆的人民曾经万众一心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种种经验和困难都学过了。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也犯下不少过错和失误。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过多地强调政治斗争，不断革命，有的根本没有必要，因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的经济需要。其次，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任党委和书记不必要地干预国家机关、企业、农业生产、学校和文化团体等等经营管理。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达到高峰，导致一场彻底的灾难，断送了本该用于建设性工作的关键的十年时光。

幸而，共产党及其领导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公开承认错误——这对任何一个政党或其领导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样一个重要民主党派的成员，我

对共产党的勇气十分钦佩。今天它重新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规划。

了解这点历史背景以后,你们更能评价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及其意义。不论是经济、教育、科技、政治、法律或文化,任何一项改革在某些方面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开始的改革的延续,而在许多方面则是对那场浩劫以前以及浩劫期间的种种错误观念和政策的逆转和矫正。

奇怪的是,原来以为涉及近八亿农民生活的最复杂最艰难的改革倒是进行得最有成效,也比较容易。农民们一旦挣脱桎梏,便显示出无比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他们有权一户或几户自由结合起来,承包大小肥瘠不等的一方土地,交纳土地税,卖给国家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后可将多余部分自己上市出售。农艺技术和机械化深入农村,农民的购买力大大提高,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大大增长。

继农业改革的成功,小型乡镇工业也大为发展。到1985年为止,乡镇工业吸收了6400万农业人口。他们对工业生产、国民经济总收入和农业进步的贡献是惊人的。据估计,如果这类工业继续发展提高,到2000年,将有三亿至四亿农民不必离开农村而转为工人,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的根本变化。

这些发展对城市地区产生重大压力,特别是国营企业如今面临如何改革工艺及管理以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这一严重问题。培训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人员已成为当务之急。国营企业还不得不应付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城市的改革只能说刚刚起步。

经济改革已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相应变化,又转而

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段的人对待多种问题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状态。新工艺以及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引进,促使人们对传统价值体系产生怀疑,特别在青年人中间。因此,不难看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流动不居的社会,人们热烈争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胆实验,思路宽广,不断学习吸收古今中外的最优秀言论、行动和思想。可是,请各位注意,我们不抄袭任何现成的模式或配方;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已经吃够苦头。

时间不允许我详谈我国改革方案的各个方面,有许多方面我也没有资格谈论。我只谈政治民主化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这些都是今天的热门话题。

过去这几年中,政治体制有过许多小改、小修,例如废除党政干部的终身制,起用年轻有为、有知识、作风正派的人当领导,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成立职工大会监督厂矿企业的管理,等等。但是,还有不少改革尚待进行。我必须提一提最近一项我认为极有意义的发展,那就是,更民主、更科学地制订国家政策。前面我触及到共产党的两大主要缺点。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缺乏组织完善的咨询和配套体系,缺乏批评、监督和反馈体系。负责干部“心血来潮”,订出某项重大政策,硬性推行,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这种做法盛行多年。更加糟糕的是,决策人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强迫政策研究者提供统计数字也即不过硬资料作为他们错误判断的佐证。现在到了结束这种危险、造假、害人不浅、极不民主的做法的时候了,也是创造一个民主、协商、公平的政治气氛,贯彻“双百”方针,采取法律手段保护政策研究者的时候了。

你们可能以为我在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绝对不是这样。我

的话乃引自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最近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刊登在1986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他狠狠批评干部在制订政策时缺少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否则我就不会这么厉害地责怪他们。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批判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和人的尊严等思想,斥之为消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对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用处。可是,如果摒弃这些思想和理想而把它们拱手送给资产阶级,那么,除了独裁、阶级斗争、恐怖等等,还剩下什么呢?难道这就算社会主义吗?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资产阶级民主固然有它的局限,有其形式主义的一面,但是运用得当,还是有价值的。我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应该绝对保证,严格执行宪法规定的条款:让人民有更大的权利选举中意的人管理自己,发现他们的不称职或渎职时罢免他们;让胜任的人参与制订政策、监督贯彻政策;让民主党派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务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更好贯彻。总而言之,如果能让更多民众参政,社会主义政体及其采取过的全面改革一定会更成功、更稳固。

我们关心的另一方面的改革是文化价值观念。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事实:政治体制不更动,经济改革不可能彻底成功。同样,没有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应变化,政治、经济改革都不可能完全成功。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一个可以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今天无法详谈。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极其灿烂的文化遗产,它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我们应该怎样鉴定从孔子到毛泽东等前人留给我们的古老文化?有人主张听其自然,让时间进行选择。问题是,有些思想、习

惯和常规就是不适合现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即抛弃。下面举几个例子。

从前,农田庄稼收成的好坏完全听命于天,老百姓的社会公正待遇听命于圣君、贤相和清官,总是盼望救世主“降世”,日子才能好过些。正是这种“救世主思想”融合在现代领袖身上,产生了“个人崇拜”。许多干部过去受这种思想的哺育,至今仍在灌输这种思想。如果这一状态继续存在下去,政治生活怎么可能民主化?在经济问题上,老习惯崇尚节俭、不乱花钱、不举债,这倒也不是坏事;同时又有一些企业求大求公,贬低集体和私营成分的作用,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专有品德思想。在社会问题上,绝对平均主义、不计劳动量的平均分配制,我们称之为“大锅饭”的思想,在干部中间仍很流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特权、任人唯亲、利用裙带关系谋求私利。总之,封建思想和习惯的残余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和惯例还继续在阻挠改革。

我们不愿看到人们把婴儿随着洗澡水一起倒掉,应该除恶存善。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所谓的“精神文明”。当今世界上不乏物质文明先进而精神文明退化的实例。我们希望二者并举。我们希望保存自己的文化财富和特征。但是社会变革乃势在必行,文化的内容也必然随之而变。我们愿意接受东西方各国文化的精华,但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文化的核心仍应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相信诸位和我一样不愿意人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激变时期中消失。

前面介绍了我国正在进行的一些革命性改造的大致情况。现在想和你们一起寻求帕斯卡说的“光明”。“光明”何在?它存在于我们的目标,今天只是依稀可见,越走近去,变得越清晰。在历

史现阶段,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我们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到 21 世纪中期赶上发达国家。我们正全力以赴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因此我们极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国内环境、和谐的人际环境、健康的思想环境,为的是不消耗力量而是集中力量走向那宏伟的目标。

搞试验总会有风险、错误、失败和迂回曲折,但是,前进的潮流不可逆转。我总是对外国朋友说,看中国必须有长远观点,看上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才能作出结论。但是目标在那里,光明在那里。你们中间有人去过中国,有人将去中国,都可能碰到一些中国人爱嘀咕抱怨或者批评。他们敢于把话说出来,终究是一件好事。不错,他们仍然感到不满。如果人人满足,那还要我们努力干什么呢?戴高乐将军常说:“当年人民不幸,现在人民不满,这已是前进了一步。”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以推动进一步发展。

最后让我谢谢今天在座诸位贵宾、诸位同事和威尔逊中心的工作人员,谢谢这次集会的筹备者们,特别是毕林顿、吉福德、韦尔斯、霍尔采尔等教授,戴维博士,以及在工作 and 生活中给予我照顾的各位。祝大家健康长寿、诸事顺利、感恩节快乐、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

人权研究在中国^{*}

我是五年前才参与人权研究的。1989年3月23日,我和一些同行共同创立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我们提出研究人权问题的重要性。1989年12月、1991年7月,我们先后组织了两次人权研讨会。此后我们又提议就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已部分地吸收在最近出版的《国际人权纵横》(时事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该书汇集了有关论文数十篇,共分五个部分:

一、国际人权的概念

二、人权的历史发展

三、人权的思想与概念

四、世界各地人权的演变与民族特征

五、人权与国际关系

我本人仅是这项研究计划的组织者,我的专业是历史,因此严格地说,我不具备讨论这个基本上属于政治与法律领域问题的资格。但我很愿意听取外国学者对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的观点和意见。

就我的教育、我的经验而言,我认为“权利”或“自然权”

^{*} 本文为1994年3月2日在马尼拉国际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是不存在的。无论在家庭或在学校中传授的品德如仁、义、礼、智、信、忠、恕……都属于义务与天职范畴。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英国的权利请愿书(1628)和权利法案(1688),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传入中国后,权利或人权这个概念才开始对中国一小部分革命精英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人权思想不是本土的产物,非一朝一夕能植根于我国。何况人们逐渐发现,宣传人权思想的外国列强、我们的“教师爷”们,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未停止侵犯我国人民的权利。一百年后,他们又竭力支撑、援助在全国镇压民主和爱国运动的反动政权。人们开始怀疑和不信任那些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醒大家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31 页)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牢记的历史背景,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对许多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感情反应,这也包括对人权的概念。只有那些不懂历史现实的人才会有意无意地侈谈人权而不加具体分析。

对我国来说,人们的人权意识近年来有所提高,对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悲惨经历,在那个时期,人权和人的尊严遭到无情的践踏,以致在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要求保护人权的呼声从未如此响亮。二是 1989 年“六四”事件后外来的压力,我们需要应付和分别许多恶意和善意的干预。当我们创立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时,我就预感到必须改进我们的人权状况,加强我们的人权研究。而首先要做的是澄清并在可能范围内对人权概念及其应用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

在上述 1989 年和 1991 年先后召开的人权研讨会上,我们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是:

人权是一个阶级概念,还是带有普遍性?用流行的言语来说:它是姓“资”还是姓“社”,还是中立的?

人权是天赋的,还是恩赐的,或是需要斗争得来的?

人权有无一个普遍准则,还是每个民族能依照其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情况加以界定?

人权与国家主权的正当关系是什么?对那些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制裁,实行双重标准的政府应该如何对付?能否把一切有关人权状况的抨击、批评、意见、建议都视为对一国内政的干涉?应如何加以区别?

对人权的各个方面——政治、社会、经济、环保、妇女、儿童等——是否应给予同等重视,还是应根据各国的特点决定其轻重缓急?

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有关问题,因时间关系不在此一一列举。对上述问题的各种解答、分析、论点已基本上总结在我们这部《世界人权纵横》^{〔1〕}一书中。应该说,我们对于人权的概念和内涵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新认识,而这种新认识是通过解放思想与自由讨论得来的,其关键性的突破是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遵循了实事求是的路线。

与此同时,我希望看到一些西方领袖与学者对人权概念也完成一次再认识。最近二十五年来人权思想已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充实,如果继续局限于 17、18 世纪的个人与政治权利的观念,漠视集

〔1〕 夏旭东、马胜利、段启增主编,时代出版社,1993 年。

体的、社会经济权利,这无异于思想僵化和时代错位。已经到了抛弃人权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和把政治与经济政策挂钩的时候了。这样,东西方总有一天会在中途相遇。我在去年11月香港人权会议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两个月后,恰好温斯敦·洛德几乎用同样的言词,说美国不对中国强加其人权标准,中国人和美国人可能在更合理的情况下在中途相遇。(1994年1月19日在纽约亚洲学会上的讲话)我希望这话是认真的。

在我们方面,应继续防止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并在人民中间做更多的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人权与法律意识。同时,我们要敦促立法机构加速制定保障宪法中规定的权利的法律。在我看来,人权只能通过法制和民主参与来保证。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近通过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妇女儿童权利、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环保等法案,都是健全法制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与民主监督系统需要几年、几十年的实践。匆匆忙忙的、迫不及待的刺激,特别是外来的刺激,实际上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候反而会有害。但我欢迎一切人权工作者和理论家向我们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和批评,相互交换意见。我们的学会也愿同国外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

中国有一句谚语:“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人权方面说,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侵犯人权的事。因此,让我们首先清理一下自己的房子。有些人对本国的问题视而不见,专门喜欢把鼻子伸进别人的厨房,并且发号施令,把自己的菜谱强加于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打一个问号。提出忠告是一回事;强加条件则是另外一回事。

1994年3月2日